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孙庆伟

坚持“两创”
铸就辉煌

核心阅读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提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代表着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第一个高峰。

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人薪火相传、焚膏继晷，就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研究课题，交出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答卷”，为构建中华文明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考古人的独特贡献。

考古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类文明的遗存，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复杂系统，可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一门学科的繁荣发展、根深叶茂，虽然需要起于累土、不择细流，但要真正立起来，必须要“得其大者”。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国考古学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运用“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回答好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展现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

长期以来，西方理论界、学术界形成了对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主导性话语优势，导致了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相提并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



▲浙江上山遗址。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陕西秦始陵陪葬坑出土铜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文明形态。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提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40多年过去了，中国考古学虽然在重大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学科理论的系统构建思想上，仍然没有超越以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第一个高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关键在于不断增强考古学学科的主体性，必须要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要扬弃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发展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因素，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探索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规律中提供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案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考古学是探索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中国现

代考古学对中华文明的探索，从来都离不开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命运的观照。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考古学，决不能躲进象牙塔、置身世局外、关门搞研究，而要结合学科特点、发挥学科优势，积极主动回应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在阐释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探索总结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经验和普遍规律，在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和博物馆交流等各领域，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交流合作，为保护人类文明贡献中国力量。

要大力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复合型高水平考古领军人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衡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禀赋，助力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加开放包容、互信互鉴、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在坚持群众史观中推动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考古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考古学怎样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需要考古工作者朝着什么方向努力？文物和历史文化资源，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文化资源，考古学要科学回答好人民之问，就要走与人民相融合的学术道路。

考古工作本来就植根于人民，所发掘的都是先民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同样也必须面向人民，直面群众需求，让考古学科的成果和价值走进日常生活，让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体会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要“让文物活起来”，善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策划沉浸式、互动式的考古成果展示，使文物古迹成为人们了解中华文明的生动课堂和鲜活教材。“让遗址会说话”，深入阐释大遗址的文明深度和历史厚度，有效贯通考古学的“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积极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在把握时代脉搏中寻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之道

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人薪火相传、焚膏继晷，就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研究课题，交出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答卷”，为构建中华文明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考古人的独特贡献。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研究不断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深入、走向世界。北京田洞遗址4万年前人骨DNA分析及许家窑人、灵井人、马坝人等中国古人类化石高分辨率CT技术研究，为揭示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新思路新线索。浙江上山遗址的万年稻米和北京东胡林遗址的万年粟黍粒是东亚地区农业起源的重要物证。浙江良渚古城的系列重大发现，不仅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而且突破了文明社会“三要素”的传统判断，构建了“文明”定义的中国标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文明独有的“多元一体”格局和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

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考古学，要强化使命担当，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考古力量。主动发挥学科优势，坚持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物基因，萃取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赓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扎实构建中国考古学自己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努力建设浸润世道人心、展示华夏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影响人类思想发展的世界一流学科。

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应奋发有为，书写出不负历史、不负时代的考古答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版式设计：赵德汝

因地制宜，为文物营造出「宜居环境」

李永辉

对文物“居住环境”的预防性调控，就是一种给文物“治未病”的手段。希望越来越多的文物工作者了解这一理念，让更多文化遗产“健康长寿”。

不良环境会损害人的身体健康，对于文物来说，同样如此。通过建筑学和环境学研究，改善文物“居住环境”，可以让文物“延年益寿”。

也许有人会说，控制文物“居住环境”还不简单，按照最佳保存条件，做到恒温恒湿就行了。对于可移动文物，这样做确实可以，但会带来较高的能耗成本，有悖于当前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理念。并非所有博物馆都具备这样的条件。更何况，我国还有大量存在于露天或半开放环境中的不可移动文物，如土遗址、石窟寺、墓葬等。它们受太阳辐射、降雨、风蚀、微生物等多种因素影响，所处环境十分复杂，恒温恒湿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未必是最佳方案。如何因地制宜，为这些文物营造出“宜居环境”？这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课题。

不可移动文物的环境调控，有两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对文物当前环境状态的科学评估，要准确判断有哪些不良因素，这些因素是否可以被调控。这一步至关重要，一旦做出错误的干涉调控，就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其次，要综合考量调控成本和效果。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往往与周边的山体、山体相连，具有巨大的热容和湿容，如果用传统空调设备这种机械方法来调控，会耗费大量能源和社会资源，因此需要找到一种低成本、可持续的环境调控方法。

以江苏南京南唐二陵项目为例。这是南唐时期的帝陵，墓室内有非常精美的壁画，墓室入口被打开，导致古墓整体环境的平衡被打破。开口处受到阳光辐射影响，外界空气的温湿度与墓室内部有差异。夏季，湿热气流进入墓室，使壁画和石刻表面出现结露现象；冬季，干燥的空气进入墓室，引起壁画表面水分的蒸发，导致壁画表面析出可溶性盐，产生盐结晶，对壁画的地仗层和颜料层造成破坏。我们对南唐二陵进行了连续两年的环境监测，收集了大量数据，通过计算机模拟预测在外界环境变化下墓室湿度的相应变化及其与病害的关联，最后提出一个方案：在墓室入口处设置自动的环境调控室，以减少外界空气扰动。现场实验的效果让人欣慰。通过这个环境调控室，墓室内的结露和盐析情况减少了80%，有效减缓了文物病害的发展。

另外一个案例是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的泥塑。阳光照射是造成塑像彩绘脱落的重要原因。但是，多强的太阳辐射、多长时间的照射，会使褪色幅度达到多大比例？不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就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干预、如何干预。在麦积山石窟的千佛洞，我们观察到，檐下的泥塑因为檐口遮挡了部分阳光，其彩绘相对完整，脱落率在13%左右；而底层塑像由于受阳光照射更多，脱落率接近50%，差异相当明显。通过进一步研究和实验，我们发现，只要太阳辐射造成的温度变化不超过6摄氏度，麦积山石窟彩塑脱落率就相对小。于是，我们建议恢复千佛洞的遮阳设施。这项研究也为其他石窟寺以及室外泥塑的保护提供了一个控制太阳辐射阈值的参考。

微生物也是造成文物损毁的一大因素。潮湿环境易滋生霉菌，而这些霉菌会把壁画、彩塑等文物表面的色彩“吃掉”。研究发现，相对湿度超过75%时，微生物会生长，低于70%时则不生长。南方多雨，几乎不可能保持遗址的干燥状态。那么，是否可以换个思路，采取“湿保护”？我们做了一个高湿情况下土遗址表面微生物生长的实验，发现当湿度达到99%以上时，水分会在土遗址表面形成水膜，隔绝一些微生物的氧气供应，抑制微生物生长。这项研究为潮湿地区的文物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对于地下或半地下的室内文物，展示时的照明不可或缺，而不同光照条件也会影响微生物生长。我们在南唐二陵墓室的观测实验发现，同样的温湿度下，蓝光对微生物生长有一定抑制效果，其抑制效果大于绿光，绿光又大于白光。光源的启停也能打断微生物生长过程，如果在没有游客时将灯光关闭，游客进入参观时再打开，就能有效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青砖是我国古建筑广泛使用的材料。在冬季，青砖内部的水分会冻结破坏材料的孔隙结构。我们对不同地区生产的青砖做了连续冻融实验，发现当水饱和度超过80%时，青砖经历四五次冻融循环就会损坏；而低于80%时，可能四五十次冻融循环才会损坏。因此，如果发现某个遗址青砖总是处于水饱和度80%以上，就需要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黄帝内经》的这句话蕴含着中国传统医学的智慧，文物保护也遵循同样的道理。对文物“居住环境”的预防性调控，就是一种给文物“治未病”的手段。希望越来越多的文物工作者了解这一理念，让更多文化遗产“健康长寿”。

(作者为东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从山间一片叶到万家杯中茶

王光尧

《茶·世界》展览9月初在故宫博物院开展。茶是大自然的赐予和中国古人智慧创造相结合的产物，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世界各主要语言关于“茶”的发音，不少来自中国话。虽然早就知道这一点，当我在国外访问时亲耳听到当地人发出“茶”的音，对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突然有了更切身的体悟。自然而然地，一个想法萌生了：办一个包含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层面、融通古今中外的茶文化特展，纵向展示中国6000年以上的茶文化史，横向说明不同历史时期茶文化的情况。这个想法在我心底盘旋了10多年。

我过去主要是策划一些瓷器展。如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明代瓷器和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御窑瓷器的对比展，致力于讲清楚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和影响的“天下龙泉”展，等等。这些展览主要关注器物和技术，与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历史关联度

不够。故宫博物院珍藏了大量和茶相关的文物，有器物，还有书画、图书，甚至有清代宫廷的茶室建筑。来自英国的茶器、俄罗斯的茶炊、琉球王国和日本的器物，反映了茶文化历史交流的盛况。这些是我们办好这个展览的根本条件。

这个展览不仅关注文物本身，更要和当代人的生活、茶的生产发展现状结合。经过无数次的修改，《茶·世界》展览形成了框架。

在展览中，观众会看到来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的古茶树根遗存，这是我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的遗存，距今约6000年。山东济宁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出土的原始青瓷碗和茶叶团，让我们知道战国时饮茶可能要煮或泡。类似这样的考古发现，在这次展览中并不少见。

千年茶事，变化情况如何？随着技术的进步，饮茶习俗如何一步步化繁为简？从唐长沙窑“茶垞”铭文碗到陕西省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北宋茶具，我们的饮茶方式如何在复古与创新中形成独特的审美文化？从敦煌藏

经洞出土的《茶论》到宋人书蔡襄《茶录》卷，文字如何承载茶之理、传播茶之道？展览传达了这样的理念：中国的茶道是一个文化综合体，小小茶事背后是人文和自然的结合，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

展览第三单元“茶路万里”着眼文明互鉴，讲述历史上有哪些贸易路线输出茶叶，不同地区“茶文化”的特点是什么。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程中，族群之间不断交换着物产，以获取更加丰富的生活用品。茶和丝绸、瓷器一样，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如何通过智慧和创造，跟世界交流沟通。一片小小的茶叶联通世界，无远弗届。

过去办一个展览，有文物的标签、出土情况说明、相关背景知识等就够了，现在的信息手段则更多。我们在展厅设置了多个方便观众自行学习的“扫码区域”。同时，我们还拍摄了多种视频，设置了很多互动空间，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让观众既能看到茶的形，也能闻到茶的香；既能感受文物之美，也能亲自体验不同备茶方法，了解制茶过程。期待观众从不



▲《茶·世界》展览展出的北宋时期的铜渣斗，内部保留了清晰的茶叶痕。
杨雪梅摄

同的文物中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产生一种于“灯火阑珊处”找到“伊人”的喜悦。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茶·世界》展览策展人)